



在目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过于热衷于原始创新未必是符合实际的选择,未达到山顶,不可能登高望远,不站上巨人的肩膀,难以实现高于他人的超越。

创新发展的路径选择

■许小峰

在今年6月9日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讲话,主要内容已在各媒体上发表。在讲话中,有些是脱稿讲的,虽未公开发表,倒也印象深刻。如在讲到中国的人才问题时,习近平谈到他交往过许多外国朋友,包括一些政要和科学家,问他们最看重中国什么,他们几乎一致认为是中国的人才,中国有非常庞大的基础人才库。习近平这段脱稿讲话赢得了台下听众的掌声和笑声,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反响,值得回味,或许每个人的理解也未必相同。

在公开发表的讲话中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是这样表达的:“我国科技队伍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这是我们引以为豪的。但是,我们在科技队伍上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就是创新型科技人才结构性不足矛盾突出,世界级科技大师缺乏,领军人才、尖子人才不足,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同生产和创新实践脱节。”总书记这样讲与实际情况是吻合的,反映了中国目前科技人才队伍的真实情况。问题是面对这样的人才结构,如何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科技政策,采取与客观实际相配套的措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

笔者在一次关于科技发展的座谈会上,听到过另一方式的表达。有位院士谈到,在与一位欧洲很优秀的科学家交谈时,这位

欧洲专家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潜力给予了很高评价。而这位院士不太认同,回应这位欧洲同行说:“我们的问题还有很多,特别是缺乏顶尖的优秀人才,在许多领域尚难以赶上国际先进水平。”这位老外听后则另有看法,认为顶尖的科学家固然重要,但他们主要的作用是提供新思想,突破现有理论,把握发展方向,这样的人很少,而所提供的理论、思想、观点都能在一些科学刊物上发表,有的也可以通过网站搜索到,但与实际应用尚有距离。而能将这些思想在实际中实现的人,同样非常重要,中国不缺这样的人。

中国缺不缺这些能将先进理论付诸应用的人,尚难以评判,因为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或许中国在一些领域的学习模仿能力可以多少印证这一点,但也确实在许多领域,即使有了成熟理论,由于在技术、工艺、组织、竞争等方面存在问题,并未获得成功。但这位欧洲科学家确实点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当我们总是惋惜缺乏具有创新能力的领军人才时,是否在挖掘那些藏有闪光思想的宝贵资源方面下足了功夫呢?包括科技期刊、网站,书籍、会议、报告、交流等。这些免费的他山之玉,拿来都是宝,经过雕琢加工、重组对接,便可以为我所用。在国家的科技强国战略中,确实有引进、吸收、再创新的要求,在有些领域做了,收获颇

丰,但显然还远远不够。

笔者平时也参加过一些课题、文章的评审,评审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是否有创新点,这是影响最终评价结果的关键指标。但客观地讲,真正具有原始创新价值的成果并不多见,不少是在他人成果的基础上修修补补,有些则是变相重复,了无新意的“设想”,结果不在少数。有些是别人早已解决的问题,稍加变化就作为难题来攻关。国家花的是冤枉钱,个人付出的是无谓的,在半山腰打转,离登顶尚远。不知还有多少人仍在这类所谓“创新”的号令下追求、寻梦,试图达到力所能及的目标。

再回到那位欧洲科学家的评判,他清晰地看到了中国发展中的另外一面,虽然缺乏顶级大师,这需要漫长的积累,并受到基础、时间、环境、机制、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并不妨碍跟踪、追赶、学习、模仿之路,许多后发国家取得科技上的成功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包括日本、韩国等。设法将有价值的理论、思想转变成应用方法,产生实际价值,能这样做并取得成功的人,也是很了不起的,美国许多著名的大企业,如微软、苹果,取得了影响世界的成就,可以说创新成果无数,但未必有多少能真正称得上是原始创新。

中国的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等新兴企业

近年来迅速发展,也是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学习、模仿、创新之路,站在他人的肩膀上实现了超越。华为经过20多年的磨炼拼搏,已发展成为在一个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能与世界知名公司一较高低,但在谈到创新时,创始人任正非先生也是很冷静的,他说:“我们只可能在针尖大的领域里领先美国公司,如果扩展到火柴头或小木棒这么大,就绝不可能实现这种超越。……要防止盲目创新,四面八方都喊响创新,就是我们的葬歌。”

我绝无任何否定创新发展之意,只是希望将创新的内涵和领域界定好,将中国科技、人才、的现状把握好,在目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过于热衷于原始创新未必是符合实际的选择,未达到山顶,不可能登高望远,不站上巨人的肩膀,难以实现高于他人的超越,渐升的高度无法跳过,必经的路途一定要走。认识到这一点,面对我国的现实条件,分析清楚优势与劣势,确定好自身的发展阶段,除在一些有着特殊需求和外界条件限制,及少数能达到国际顶尖层次的领域和人才身上给予足够支持外,引进、吸收、转化方向上倾斜,应是一条与现实国情相符的发展之路。

(作者系中国气象局副局长)



社会治理中政府的责任重构

■王斌

在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中,政府作为主导者,必须要明确自己的角色和作用,要敢于放弃本不属于政府的权力,真正以职能转变为契机,实现政社分开的改革要求。基于这一观点,笔者认为政府在社会治理体制中需要对责任进行重构,即以构建社会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公共对话机制、公共承诺机制和非营利组织的三级登记监管机制为主要职责,使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在社会治理中真正发挥其主体作用。

1. 建设社会信任机制是社会

治理体系存在的外在前提。建设社会信任机制是政府首要的职责,也是由政府主导构建社会信任体系的外在前提。

这个社会信任机制就是基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治理基础、以健全的法律法规为约束,社会整体氛围中社会认同的普遍信任机制。毫无疑问,政府是这一机制建设的责任承担者。

面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和传统家族社会瓦解的现实,政府在建设社会信任机制的工作中,要以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前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和核心,以法律法规为约束,构建一种具有广泛适应性和稳定性的普遍信任模式。

这种模式的建立非常重要,但是将会非常艰难和漫长,其所需要的资源只有在政府的主导下由社会共同建设,但是政府在这一机制的建设中,必须以社会文化的营造为切入点,对社会信任的重建做出表率 and 引导。

2. 建立和完善信息共享机制是社会

治理体系存在的内外系统性条件。信息共享机制是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社会成员之间形成良好关系、协调发展的内外系统性条件。政府通过构建和完善信息共享机制,首先能够使社会信任机制进一步完善,使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责任、职能和权力更加明确,使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社会公众在社会治理中能够更好地合作与协同,使社会公众能够更多地参与到非营利组织的各类公益活动和社会工作中,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各类主体能够为积极发挥作用获取足够的各类资源。

3. 建设公共对话机制是社会

治理体系存在的责任。在建设信息公开机制的同时,需要政府承担起构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社会公众之间的公共对话机制的责任。

这一机制中包括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对话机制,以及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对话机制两个部分。在对话机制的建设中,政府能够摆脱管理者的思维和管控社会的理念,要坚持和承认政府、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之间是具有平等的对话地位。

因此,政府就需要培育和激励非营利组织、社会公众敢于与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平等对话的勇气,并积极构建制度化的对话机制,规范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对话的规则。

4. 建设公共承诺机制是社会

治理体系存在的重要内容。在以上几个机制的基础上,达成共识性承诺是很重要的一个结果状态,所谓公共承诺机制,就是要在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社会公众之间建立一种为了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的目的,为了平等合作,对社会治理以合作的姿态承担公共责任的表示认同的机制。在这一机制的建立中,政府需要具有魄力,勇于将那些具有政府背景的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剥离,使其能够真正实现自治,从而真正能够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格局。

5. 改革非营利组织登记制度是

激发非营利组织整体活力的重要措施。在取消业务主管部门批准,直接登记注册的改革中,政府还需进一步探索对非营利组织的激励管理,也就是说,通过管理体系激发非营利组织服务社会的制度设计是非常重要的。

笔者认为可以在登记制度改革的同时,采取“认定、登记和监管”体系,激发非营利组织的活力。

具体是: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建设一个普遍备案的注册平台,通过备案注册获取所有非营利组织的基本信息,并赋予其基本的合法形式;其次,构建全国非营利组织登记认可平台,对满足特定条件的非营利组织实行登记认可制度,通过认可的即具有法人地位;最后,对从事公益事业的非营利组织实行公益法人地位。

这三层的监管和评价是递进提升的,但是其享受的政策和资金资助也是要具有重大的区别的。这个方式可以拓展非营利组织的准入门槛。

由于上一级的非营利组织形式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低级别的非营利组织为了获得更多资源和政策,会积极承担其社会公益责任,而同时监管的规范也更加严格,这就大大激发了非营利组织整体的活力。

(作者系西南大学副教授)



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现实是,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与西方差距较大,无法与之全面抗衡,只能重点突破。

中国媒体如何提升国际传播能力

■唐润华

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部署,2009年以来我国媒体采取了很多措施加强国际传播能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力增设分支机构。即建设覆盖广泛、技术先进、反应敏捷的新闻信息采集和传播网络。例如,新华社海外分支机构从2008年的106个增加到了2013年的178个。中央电视台已在全球建成70多个海外记者站、中心记者站和分台。

二是加大本土化力度。本土化包括人员本土化、运作本土化和产品本土化。人员本土化在人才上拥有资源优势,在语言文字、习俗和心理上拥有文化优势,在住房、薪酬和交通上拥有成本优势。运作本土化主要是指编辑部前移,这样可以提高新闻的时效和针对性。产品本土化是指根据地区特点调整内容结构。

三是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在传统传播渠道的基础上,现在各个媒体都加强了媒体终端建设和市场化运作。比如在建设新终端方面,新华社下属的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的终端形态就很多。各种各样的终端传播同样的内容就可以覆盖更广泛的国际市场。市场化运作首先要将中国媒体的国外分支机构公司化,只有公司化之后,才具备经济运作的资格。

四是“借船出海”,即借助国外现有渠道,加速进入国外传媒市场。主要方式包括购买版面、时段,交换新闻信息,合办版面、节目,参股国外媒体等。

五是加强媒体外交。媒体外交是一国公共外交的一部分,是媒体机构为改善国际社会对自己的态度而开展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

近些年中国媒体在加强媒体外交方面进行了如下努力:

建立全球媒体平等交流机制。只有建立了与国际媒体的交流平台,才有可能建立平等的协商机制,也才有可能掌握话语权。

加强与权威国际组织的合作。中国媒体可以借助其权威性,提升业务和活动的影响力;借助其网络,提升业务和活动的广泛性;借助其资源,提升业务和活动的质量。

举办全球性媒体公益活动可以提高中国媒体的参与度,增加中国媒体与国际社会的共同语言,促进中国媒体的业务发展。加强与各国高层人士交流可以改变其对中国看法和态度,提升新闻报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更有利于业务拓展。

今后,中国媒体提升国际传播能力还需要进行理念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从“全面铺开”转向“重点突破”。“全面铺开”往往事倍功半,而“重点突破”则可以事半

功倍。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现实是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与西方差距较大,无法与之全面抗衡,只能重点突破,而且中国媒体自身的资源和实力也有限,无法全面挺进。

重点突破战略应该在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等方面进行精心选择,将有限的资源优先用于能最有效地影响国际舆论的地方,最大限度地提升国际传播的效率和效果。传播内容应该主要放在中国新闻上,因为海外受众渴望了解中国,而外媒的中国报道既不充分也不全面。中国需要向世界展示自我,而报道中国新闻恰恰是中国媒体的优势。

传播渠道方面,传统媒体的渠道固然需要,但我们更需要大力度地向新媒体终端拓展。传播语言方面应以英语为主,因为英文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语言,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媒体大多数都是英文媒体。在传播地区方面应倾向于西方主要国家,西方主要国家主导着世界的发展方向,掌控着世界舆论的走向。在传播受众方面应倾向于精英阶层,“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尤其是各国的官员政要、各界名流、知识分子群体等。

从“内外有别”转向“内外一体”。“内外有别”是指对外传播与对内传播在对象、目的、内容、方法和语言等方面均有不同,应区别对待。“内外有别”在我国对外传播历史上发挥过重

要作用,但在新形势下其适用性和有效性遭到了诸多限制。“内外一体”是指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出发,遵循新闻传播和媒体发展的普遍规律,将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统筹运营,形成协同效应,实现协调发展。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是一个有机体,不能截然分开。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都要遵循新闻传播普遍规律,即都必须以真实、准确、全面、客观为基本准则。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还应相互配合好,形成协同效应,各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在此基础上加强协作,加强联动互动。

从“软硬不均”转向“软硬并举”。“软硬不均”是指只重视硬实力,忽视软实力;只重视硬件建设,忽视软件建设。“软硬并举”是指既重视硬实力,更重视软实力;既要加强硬件建设,也要加强软件建设。国际传播的软实力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际传播内容的改革与创新,要求媒体顺应新闻信息传播规律,顺应海外受众的需求和习惯,顺应媒体发展的最新趋势。此外,还应加强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建设,适当增加营销、新媒体人员和本土雇员,从知识结构、专业技能和职业精神三个方面提高国际传播人才队伍的素质。

(作者系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时事漫话

师者,当行为世范

■沙森

七月毕业季,中国各地往年火爆风行的“谢师宴”“升学宴”“状元宴”今年有点冷。安徽铜陵、广东江门、海南海口、湖北宜都、山东滕州等多个省市教育部门和纪检部门日前出台相关规定,严禁党员、干部操办“谢师宴”,严禁教师参加宴请,或接受学生及家长赠送的礼金、礼品,对违规者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尊师重教的国家。“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在传统社会中,老师也被认为是一个除父母之外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家长感谢老师对孩子成长的教育和帮助本无可厚非,但近年来,谢师却在不知不觉中趋于功利化,演变成用金钱和排场衡量的“谢师宴”,老师不堪“赶鸭子上架”,家长也不堪攀比与炫富。传统社会中“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美好场景已经不

复可见。在教育资源分布极不平衡的当下,所谓谢师也极有可能成为寻租和教育腐败的温床。

对于家长和学生而言,感恩师恩回归单纯,回归心灵。或许只需过年时的一条祝福短信,过节时的一束鲜花,甚至多年回乡后的一次登门、一句感谢,都是谢师最好的表达方式。对于教师而言,更不能将自己拥有的教育权力作为寻租的工具,直接或变相地索取或接受家长和学生的所谓“礼品”。

7月14日,针对少数教师利用职务之便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行为,教育部官方网站发布《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金等行为的暂行规定》,设立6条“红线”,严禁教师以任何方式索要或接受学生及家长赠送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

财物。

所谓师者,本应当行为世范。著名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曾说过:“太阳底下再也没有比教师更崇高的职业。”教师,本应该是道德卓越的优秀人物。这一观点在肯定了教师崇高地位的同时,也对教师的道德品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讲,教师的职业道德已不是个人意义上的品德问题,而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关系到下一代的健康成长。

然而现实是,部分教师非但没有引领社会道德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反而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腐败风气的推动者。更有甚者,甚至成为制造儿童侵害案件的高危人群。



教师的道德,应该是社会道德中的最后一块净土。师道若毫无尊严可言,民族的希望在哪里?

翟小芸供图